

# 激情與反思

## ——斯圖盧威與三次俄國革命

• 張建華

斯圖盧威 (Петр Бернгадович Струве, 1870-1944) 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俄國思想文化界的重要人物，也是俄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領軍人物，其思想演變經歷了從「左」到「右」的多次搖擺，發生了從「馬克思主義」到「激進自由主義」，再到「保守自由主義」的游離。

1901-1921年的二十年，是斯圖盧威自由主義思想形成和實踐的重要階段。在二十世紀初俄國政治大風潮和社會急劇轉型的過程中，斯圖盧威同其他俄國知識份子一樣，經歷了1905年改革與革命的激情撞擊，經歷了1917年二月革命的痛苦回憶，以及1917年十月革命後的艱難抉擇。這時期中唯一不變的是，斯圖盧威將俄國社會變革的未來命運與自己的自由主義理想聯繫在一起，他在俄國社會變幻莫測的政治舞台上成為「第一傑出的明星」①。

### 一 激情年代

1901年前後，當斯圖盧威等「合法馬克思主義者」(Легальный Марксист)

紛紛宣布在組織上與馬克思主義和社會民主黨決裂之後，他們在思想上也發生了從唯物主義向唯心主義的整體「嘩變」。俄國知識界的自由主義營壘放棄了從前的「營養基」——馬克思主義，轉向唯心主義之中尋找新的營養，轉向東正教宗教哲學中尋找精神源泉。正如白銀時代的標誌性人物、著名文學家、詩人和哲學家、俄國象徵主義文學流派創始人梅列日柯夫斯基 (Д. С.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所感嘆的，「我們走到了康莊大道的盡頭，再前進一步都是不可能的，但我們知道，在歷史結束的地方，宗教就開始了。在懸崖的邊上，我們自然地、不可避免地會想到翅膀、飛翔，想到超歷史的道路——宗教」②。1902年，由梅列日柯夫斯基和他的妻子、著名詩人吉皮烏斯 (З. Н. Гиппиус) 倡議，在彼得堡建立了「宗教與哲學協會」(Религиозно-Философ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斯圖盧威在1913年前參加了這個團體活動。後人稱他們為「尋神派」，稱他們的學說為「尋神論」。普列漢諾夫 (Г. В. Плеханов) 在1909年發表文章〈論俄羅斯所謂的宗教探索〉(“О называемом

1901年前後，斯圖盧威等「合法馬克思主義者」宣布在組織上與馬克思主義和社會民主黨決裂後，他們在思想上也發生了從唯物主義向唯心主義的整體「嘩變」，轉向東正教宗教哲學中尋找精神源泉。一位著名詩人感嘆說：「我們走到了康莊大道的盡頭，再前進一步都是不可能的，但我們知道，在歷史結束的地方，宗教就開始了。」

斯圖盧威(圖)作為組織者和作者參加了1902年出版的《唯心主義問題》文集。作者們批評了馬克思主義和實證主義過於強調人的社會屬性和功利主義，強調只有以不可割讓的人的權利為理論源泉的唯心主義哲學，才是維護個人權利的最堅實的理論基礎。



「*религиозном разыскании*」），把「尋神派」稱為「承受不住1905-1906年打擊的知識份子靈魂的無袖短衣」。「尋神派」認為自己的思想源於十九世紀俄國著名哲學家索洛維約夫(В. С. Соловьев)的學說，認為宗教信仰和神秘主義是俄國哲學的根本，只有宗教哲學才能解決存在和意識的最重要問題，認為必須把基督教教義和世俗生活結合起來，才能解決人的問題、社會現實問題和歷史發展問題。

斯圖盧威作為哲學家對二十世紀初俄國唯心主義思想的發展發揮了顯著的作用，他作為組織者和作者參加了1902年出版的《唯心主義問題》(*Проблемы идеализма*)文集。該文集的出版是俄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在二十世紀初的第一次思想集結，文集作者還有宗教哲學家布爾加科夫(С. Н. Булгоков)、別爾嘉耶夫(Н. А. Бердяев)、弗蘭克(С. Л. Фраиш)、諾夫哥羅德采夫(П. И. Новгородцев)、特魯別茨科伊(С. Н. Трубецкой)、阿斯科爾多夫(С. А. Аскольдов)、特魯別茨科依(Е. Н. Трубецкой)等人。

作者們批評了馬克思主義和實證主義過於強調人的社會屬性和在功利主義方面的偏差，強調只有以不可割讓的人的權利和個人不可侵犯性為理論源泉的唯心主義哲學，才是維護個人權利的最堅實的理論基礎。文集的前言強調：「現代哲學……首先要研究複雜的生活問題，正是深刻的道德意識推動我們對責任性和道德性的思想問題的探討」<sup>③</sup>。《唯心主義問題》的出版標誌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完成了第一次思想蛻變，即徹底割斷了與馬克思主義和以後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思想聯繫，轉向俄羅斯文化傳統——宗教哲學和俄羅斯人的宗教心理尋找俄國發展的動力，簡言之，即否定了他們最初借用馬克思主義思想來指導俄國道路的嘗試。由此，斯圖盧威的政治思想和理想也向保守與「右」的方向邁進了一步。

1901年4月，斯圖盧威參加了在彼得堡喀山大教堂舉行的知識界大遊行，遭到警察毆打，後被捕。沙皇政府禁止他在首都和大學城居住，及後流放特維爾。當年夏天斯圖盧威與地方自治活動家聯繫，並接受他們的建議在國外編輯反對派雜誌<sup>④</sup>。1901年底，他來到德國的斯圖加特，加入地方自治局知識份子反對派的行列<sup>⑤</sup>。

1902-1905年，斯圖盧威擔任了在國外出版的非法雜誌《解放》(*Освобождение*)的編輯工作。《解放》是俄國自由資產階級的雜誌，1902年7月在德國斯圖加特出版，每期印數大約是九千至一萬份。與社會民主黨(布爾什維克)的報紙《火星》(*Искра*)和社會革命黨的報紙《革命俄羅斯》(*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Россия*)不同的是，《解放》編輯部試圖吸收有知識的俄國階層參加，他們反對革命，主張在政權進行改革的前提條件下與政權和

解。1904年1月，圍繞着《解放》雜誌建立了俄國自由主義者團體「解放同盟」(Союз освобождения)，它是後來的立憲民主黨的基礎，也是俄國資產階級的第一個政治團體。

斯圖盧威準備將「解放同盟」變成反對專制制度的統一營壘，為此他承擔了看似無法完成的任務，他試圖將來自激進主義派別和自由主義陣營的各界人士聯合起來，但是建立廣泛聯盟的設想最終未能實現，保皇派組織和激進主義者對他的號召均無響應。很明顯，這個事實影響了斯圖盧威未來的政治立場，促使他形成了必須與兩個極端——君主主義的「黑色百人團」(Черный сотен)和左派激進主義者決裂的想法。

斯圖盧威在國外的政治活動由於沙皇尼古拉二世於1905年簽署「10月17日宣言」而結束，這個事件促使他決定不等待政府特赦就返回祖國。為安全起見，他用馬克西米里安·沃羅申(Максимилиан Волошин)的名字印製了假護照，在已經拿到了去科琅施塔德的火車票後，才聽到政府大赦政治犯的決定<sup>⑥</sup>。回國後，斯圖盧威在彼得格勒一直住到1918年。這是他一生中的困難時期，其間不僅有參加政治活動、創作的快樂，也有對於革命問題的痛苦思考，而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對「偉大的俄羅斯」(Великая Россия)問題和知識份子命運問題的思考。

1905年革命中表現出的政府的殘暴行為、革命的嚴酷和流血以及國家的無政府主義狀態嚇壞了斯圖盧威。他在1905年11月就指出：「在俄國生活的範圍裏存在着獨裁，獨裁被稱作『黑人百人團』，獨裁被稱為『革命無產者』」，「我們表示，國家不需要和反對任何樣的獨裁，國家需要的只是

法律、自由和經濟的復興」，斯圖盧威呼喚：「快使政權擺脫災難」<sup>⑦</sup>。但是俄國全社會已經由於激動而失控，並且使社會運動超出了政權允許的範圍，隨後到來的只能是毀滅。

斯圖盧威像從前一樣，習慣於通過出版物來表達自己感興趣的政治問題。他在1905-1906年編輯出版了周刊《北極星》(Полярная звезда)，並加盟《自由與文化》(Свобода и культура)雜誌社，同時還為《思考》報(Дума)工作。但是，這些報刊的命運都是短暫的。原因在於，斯圖盧威不會也不想使報刊適合廣泛的和大眾化的讀者口味，而沒有讀者基礎的報刊自然難以為繼。但是斯圖盧威人生中的這個插曲並不影響人們對他的編輯才能的評價。在共同的出版工作中，最接近和最了解斯圖盧威的弗蘭克認為，編輯工作最能體現斯圖盧威多方面才幹，「……斯圖盧威將個人思想的原創性和嚴格的原則性與多方面性和耐心性結合在一起了」<sup>⑧</sup>。

從1906年末開始，斯圖盧威領導《俄羅斯思想》(Русская мысль)編輯部，並且吸引以別爾嘉耶夫、布爾加科夫、伊茲戈耶夫(А. С. Изгоев)為代表的哲學界著名知識份子參與。在他的領導下，這份雜誌「成了二十世紀初俄國文化精神財富的真正表達者」<sup>⑨</sup>。

斯圖盧威在這時期的政治活動是與立憲民主黨密切相關的。1905年10月12-18日，立憲民主黨中央委員會在莫斯科成立。1905-1915年，斯圖盧威參加了立憲民主黨中央委員會。在1905-1907年的第一、第二屆國家杜馬中，主要由自由知識份子組成的立憲民主黨佔據了多數議席，並且在一些關鍵問題上，發揮了代議制機構的重要作用。1907年，斯圖盧威被選

1905年革命中表現出的政府的殘暴行為、革命的嚴酷和流血以及國家的無政府主義狀態嚇壞了斯圖盧威。他在1905年11月就指出：「國家不需要和反對任何樣的獨裁，國家需要的只是法律、自由和經濟的復興。」從1906年末開始，斯圖盧威領導《俄羅斯思想》編輯部，在他的領導下，這份雜誌「成了二十世紀初俄國文化精神財富的真正表達者」。

1905年革命失敗後，俄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運動由此結束。在心靈上遭受打擊最沉重的莫過於知識份子階層，大學生自殺數目迅速增加。他們普遍瀰漫着悲觀、失望的情緒，認為自己未能把握住這場運動的時機，甚至認為自己成了歷史罪人。布爾加科夫感嘆：「由以往紛爭和失敗而導致衰微的俄國社會，如今已變得呆然、冷漠和精神渙散。」

為第二屆國家杜馬議員。在第二屆國家杜馬上，斯圖盧威轉向保守派的立場，他認為必須停止革命黨與政府的對抗，揭露革命黨和政府的雙重反動，將其視為對法律的威脅。他認為在「10月17日宣言」發布後，絕對專制君主制在俄國已經不復存在，也不可能再復生。他積極支持國家杜馬與大臣會議主席斯托雷平(П. А. Столыпин)的土地改革政策。1907年6月2日，他參加了斯托雷平關於預防解散國家杜馬的對話。當第二屆杜馬被解散後，一些立憲民主黨人聚集到彼得堡遠郊的維堡，發表「維堡宣言」，宣布誓死維護「民主」和「自由」原則。結果在「斯托雷平的領帶」(Столыпинский галстук，即絞索)的陰影下，幾位立憲民主黨成員被處以極刑，立憲民主黨主席米留科夫(П. Н. Милоков)被迫流亡海外。1915年6月，斯圖盧威由於在民族問題上的分歧而退出立憲民主黨，不過他實際上在1908年就已經停止了在該黨中的活動。

## 二 尋找「路標」

1905年革命失敗後，大規模的俄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運動由此結束，俄國自由主義和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受到來自左和右兩方面的擠壓，他們思想的生存空間幾近消失。

革命失敗、改革受挫，在心靈上遭受打擊最沉重的莫過於俄國知識份子階層，因為他們是這場運動的積極組織者和熱情參與者，儘管在運動中每個團體的政治理想和實現理想的手段不盡相同，但是他們都是強烈期望俄國的政治現代化能夠走上正常的軌道。據統計，1905年革命失敗後，

大學生自殺數目迅速增加。1906年有71起，1907年有160起，1908年(沙皇制度反動統治的最黑暗時期)有237起<sup>⑩</sup>。一直標榜中庸立場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則普遍瀰漫着悲觀、失望的情緒。布爾加科夫感嘆<sup>⑪</sup>：

俄國經歷了一場革命。這場革命並未帶來眾所祈望的結果。大多數人認為，解放運動所取得的正面成果至少在今天仍然是不可靠的。由以往紛爭和失敗而導致衰微的俄國社會，如今已變得呆然、冷漠和精神渙散。

他們原以為在這場運動中自己所堅持的中庸立場和同樣中庸的政治主張能為左和右兩方面接受，但最終還是付諸東流。他們同時認為自己未能把握住這場運動的時機，未能在最關鍵的時刻扭轉運動發展的軌迹，他們甚至認為自己成了歷史罪人。

1909年，著名的《路標——論俄國知識份子文集》(*Вехи —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о рус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出版。這是在1905年改革和革命失敗後，俄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自發的對改革失敗原因和革命爆發原因的多角度思考，是對知識份子與國家、知識份子與人民、知識份子與文化傳統的深層反思。斯圖盧威在《路標》文集的發起、組織和編輯以及出版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sup>⑫</sup>。

文集收錄了斯圖盧威的〈知識份子與革命〉(“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и революция”) <sup>⑬</sup>。他在文中肯定了1905年政治改革和革命的巨大意義<sup>⑭</sup>：

革命向專制、貴族、俄國政治制度和社會結構發起了進攻。1905年10月17日這一天，標誌俄國幾個世紀形成的政

治制度發生了根本性變革。當局所有的政策、策略長期致力於阻礙國家準備和實現這一變革，與此相比，這一變革來勢則猶為凶猛。

他認為：原本隨着「10月17日宣言」的頒布就應該宣布革命的終結，因為政權已經作出讓步，保存國家杜馬和立憲君主制是首要任務。但是激進知識份子出於對國家和政權的仇恨以及人民大眾的騷動竟決定推翻政權，結果給他們以回答的是反動的勝利和野戰軍事法庭和死刑。

知識份子的錯誤在於未能及時把握人民的情緒，及時洞察政府的反動企圖，適時對政府和人民做出規勸，這源於十九世紀以來俄國知識份子長期養成的劣根性。斯圖盧威認為「俄國知識份子階層作為特殊的文化範疇，是西方社會主義與俄國文化、經濟和政治發展的特定條件相互作用的產物」<sup>⑤</sup>。「在俄國知識份子階層的許多思想家那裏，對政治產生了一種最終被歪曲的、根本矛盾的態度。將政治引向生活的外在建構——從技術觀點看，它事實上就是這樣。知識份子階層在政治中，發現了自身和民眾完整的存在（在此，我們援用「政治」，是基於外在社會建構的廣義之上的）。因此，有限的手段變成了具有無限內涵的目標」<sup>⑥</sup>。在他看來，只圖一時之快的激進知識份子不是及時體察已經迫近的政治危機，及時向人民作解釋和教育工作，而是最大限度地把自己和人民體內的破壞基因和野獸本能釋放出來，最終釀成悲劇，給人民、民族和國家造成巨大損失。

那麼，知識份子應該怎麼辦？關鍵在於知識份子應該放棄一切虛無主義、英雄主義、激進主義和無政府

主義的幻想，重新確定自己的思想意識和政治主張的「路標」。斯圖盧威強調<sup>⑦</sup>：

知識份子必須重新審查自己的世界觀，其中包括重新認識這個世界觀的基礎——對個人義務的社會主義否定。搬去這塊石頭，這個世界觀的整座建築就被破壞掉。

斯圖盧威堅信，在俄國，革命變革思想不會得到期待的結果，社會進步的目標只能通過進化的道路，和與「培養獨立的個性」相關、與建立堅實的文化工作和與知識份子優秀的創作活動相關才能實現。只有這樣，俄國知識份子才能實現「精神上的再生」（Возрождение на душ）<sup>⑧</sup>。

在這些年裏，斯圖盧威始終關注國家體制（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和「偉大的俄羅斯」問題。作為國家一員，他真誠期望看到俄國強盛、偉大和獨立。弗蘭克在斯圖盧威去世後評價：「部分是出於自己的出身，部分是出於他的內心責任，他永遠不是從『下層』，而是從『上層』來思考政治問題，他不是作為勞動社會的成員，而是認識到自己是良好的國家秩序建設的潛在的參與者」，以至把自己作為「國務活動家」來思考和行動<sup>⑨</sup>。

斯圖盧威原始出發點是試圖把國家和民族的原則（Начало）聯繫起來，他試圖將平常相互矛盾的民族思想、傳統繼承性、國家穩定以及別一方面的自由和權利的價值、保護個人免於國家襲擾統一起來。對於斯圖盧威來說，愛國主義是反映為國家——「偉大的俄羅斯」的使命和民族精神的歷史證明的信念，而他普遍的政治思想就包括在其中，即：民族統一給予

那麼，知識份子應該怎麼辦？斯圖盧威堅信，革命變革思想不會得到期待的結果，社會進步的目標只能通過進化的道路。斯圖盧威始終關注國家體制和「偉大的俄羅斯」問題。他的出發點是試圖把國家和民族的原則聯繫起來，把傳統繼承性、國家穩定與自由和權利的價值、保護個人免於國家襲擾統一起來。

1917年二月革命爆發，斯圖盧威非常興奮，對於俄國的變革寄予很大希望。對同年發生的十月革命，斯圖盧威是懷着不理解、憎恨以及對布爾什維克及其領袖們的敵視被動地接受這一事件的。他建議知識份子再次反思自己的行為，思考俄國的出路。他提議編輯《來自深處》文集，吸引大部分原《路標》文集的作者參加。

任何國家堅實性和穩定性。對自身任務的民族理解、自覺感是公民世界(Гранжданский мир)政治、社會統一力量的前提。關於國家的和平建設工作的思想和關於包括在他的其他文章中的法律秩序和原則的思想，具有一定的意義。

斯圖盧威堅信國家的宗教來源，認為政權首先具有是超出個人利益的特性。「在俄羅斯沒有發生過宗教改革，因此也未曾出現基督教道德的世俗化，未曾把基督教道德變為日常生活的方式和制度，如同西方國家那樣。俄羅斯有宗教和宗教精神，但宗教未能作為必須遵循的原則滲入日常生活之中。這是俄羅斯歷史上非常明顯的也幾乎最意味深長的事情」<sup>⑩</sup>。他認為國家具有集合性(或譯聚議性，原文為собор)的個性，並且高於任何的個人意志(Личная воля)，這是「神奇的本質」<sup>⑪</sup>。顯然，斯圖盧威對собор的理解更多地還是從超乎於任何組織、任何個人的國家的角度來考慮的，在他看來，集體主義的民族傳統和宗教習俗有利於國家的穩固，而國家的強大、安定和統一才能有效保護它的人民免於災難。為此，他提出了「偉大的俄羅斯」的概念，認為君主立憲制是最好的國家體制，而對它的破壞則被他看成是最大的危險，而且為了「偉大的俄羅斯」就不惜對外擴張，他甚至建議向相鄰黑海的所有歐洲和亞洲國家實行經濟擴張，但是他贊同波蘭和芬蘭的獨立。

### 三 「來自深處」之呼喚

1917年二月革命爆發，斯圖盧威非常興奮，對於俄國的變革寄予很大

希望，他在與好友弗蘭克見面時曾表示：「現在的俄國向前邁出了七英里的大步」<sup>⑫</sup>。他同意與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合作，並擔任外交部經濟局局長職務。後來由於擔任外交部長的米留科夫辭職，斯圖盧威也放棄了這個職務。

1917年5月，斯圖盧威組織了「俄國文化同盟」(Лига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作為「精神上的、有充分依據的愛國主義思想中心」，他被選為該同盟臨時委員會成員，並負責該組織的《俄羅斯自由》(Русская свобода)周刊的工作，這個組織和周刊吸引了持不同政治觀點的俄國知識份子中的精英。但是，在革命即將爆發的年代，宣傳俄國民主制的文化使命、鼓吹社會聯合已不可能得到社會認同和支持。1917年夏，他被選為俄國科學院政治經濟學部(1924年被撤銷)榮譽院士，在科學院的歷史學和哲學部工作。

1917年十月革命的到來造成了俄國社會的嚴重分裂，也造成了知識界人士的思想分裂，斯圖盧威是懷着不理解、憎恨以及對布爾什維克及其領袖們的敵視被動地接受這一事件的。他建議知識份子再次反思自己的行為，思考俄國的出路。他提議編輯《來自深處》(Из глубины)文集，吸引大部分原《路標》文集的作者參加。

《來自深處》繼續了《路標》的風格和思想，並且具有了更強烈的政治性。斯圖盧威在〈俄國革命和民族任務的歷史思考〉(“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смысл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задачи”)中再次批評俄國知識份子的思想盲動、好大喜功以及無政治原則，十月革命是俄國知識份子又一次政治狂熱的集中表現，它破壞了俄羅斯文化傳統，玷污了俄羅斯人民的心靈，將俄國推向災難的境地。斯圖盧

威把從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事件的道德和政治後果看成是「俄國革命導致國家的崩潰，是世界的恥辱」。「列寧將完全破壞偉大的俄羅斯強國和將血腥的和恐怖的工兵農代表蘇維埃建立在它的廢墟之上」<sup>23</sup>。

斯圖盧威再次關注知識份子、人民和政權的問題。根據他的觀點，俄國的不幸和專制制度的主要罪過在於，無論是人民還是知識階層都沒有被及時吸引參與國家生活<sup>24</sup>。在強化農奴制和壓迫政治自由的萌芽之後，俄國君主制得罪了「穿灰色軍大衣的農民，導致國家和經濟文化的崩潰」<sup>25</sup>。斯圖盧威認為國家體制被破壞和革命爆發的原因在於，「我國的農民沒有成為資產階層所有者」<sup>26</sup>。他自然再次談到俄國知識份子應負的責任，因為知識份子未能阻止破壞性的趨勢。他得出的結論是：「在俄國，社會主義思想和階級鬥爭思想的發展不是作為組織的和建設性的力量，而僅僅是作為災難性的破壞力量。」<sup>27</sup>

斯圖盧威還考慮出版「社會知識文庫」叢書，已經擬好文庫大綱，這裏不僅僅包括了他所關心的中心問題，而且還包括他的朋友們感興趣的問題。斯圖盧威寫道<sup>28</sup>：

俄羅斯的復興首先應該復興和鞏固民族精神。最真誠地奉獻於這項工作是我們文學界的任務，用對被責罵的民族文化的熱情的信心和對俄羅斯國家體制輕率損害的重視來鼓舞人民。我們的「社會知識文庫」將致力於真正的，但是通俗易懂的出版物。這些出版物涉及文化、社會、國家發展和人類日常生活，特別是俄國人民日常生活的問題，在俄羅斯人中激起歷史信念，在他們的認識之前揭露那些偽科學的、消

極的學派的謊言和廢話，這些思想的泛濫將歪曲人民의思想和毀壞國家。

由於主觀上無法接受蘇維埃政權，斯圖盧威陷入了內戰和政治鬥爭的旋渦之中。1917年11月，斯圖盧威到諾沃切爾卡斯克，參加了「頓河公民大會」(Донский гражданский)，籌備建立反蘇維埃政權的志願軍。1918年，斯圖盧威成為舊俄將軍尤登尼奇(Н. Н. Юденич)領導下的「俄國委員會」(Российский комитет совет)和軍事政治中心的成員。1918年12月，斯圖盧威秘密到達芬蘭。1919年初，他以立憲民主黨「民族中心」代表的身份到達英國和法國，為的是得到西方反布爾什維克的支持，斯圖盧威參加了在巴黎組織的「政治協商會議」(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совещание)。1919年夏末，他回到俄國南部，參加了鄧尼金(А. И. Деникин)領導的特別會議。1919年底，他返回克里木，擔任弗蘭格爾(П. Н. Врангел)政府的對外關係局局長。斯圖盧威從克里木給僑居國外的俄國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作家布寧(Н. Бунин)的信中表示，「俄國南方要比國外更需要像您一樣的力量」<sup>29</sup>。但隨後，俄國的白衛運動很快就土崩瓦解了。1921年，斯圖盧威流亡國外，1944年客逝巴黎<sup>30</sup>。

#### 四 奇異軌迹：從「激進」到「保守」

當代俄羅斯學者茹科夫(Н. С. Жуков)評價<sup>31</sup>：

斯圖盧威主要功績在於，他以自己的活動積極促進民族自由思想主張的發

斯圖盧威認為俄羅斯國家體制被破壞和革命爆發的原因在於，俄國君主制得罪了「穿灰色軍大衣的農民，導致國家和經濟文化的崩潰」，「我國的農民沒有成為資產階層所有者」。他自然再次談到俄國知識份子應負的責任，認為社會主義思想和階級鬥爭是災難性的破壞力量，呼籲俄羅斯的復興首先應該復興和鞏固民族精神。

展，促進俄國政治力量在二十世紀初關注俄國國家體制發展問題，在二十世紀末和新千年大門檻前不忽視其重要性。

透過斯圖盧威的命運，反映了整整一代人的優秀思想和導致兩個時代思想斷裂的俄國自由主義的歷史悲劇。

作為政治家的斯圖盧威已經屬於歷史，但作為思想家的斯圖盧威將永遠保留在俄國思想文化史的扉頁之中。斯圖盧威早在二十世紀初就以個人自由、文化和民族和諧的價值觀向全人類發出號召，他的學術遺產補充了我們對俄國歷史的個人理解。在自己的世界觀方面，斯圖盧威始終堅信自由主義思想和立場，因此他無論對左翼還是右翼陣營都進行了不尋常和長期的批判，同時他也被迫接受來自左右兩個陣營的詰難，而且自己也經常不自覺地滑入某一個營壘之中。斯圖盧威自稱「在哲學領域是一個批判主義的實證主義者，在社會學和政治經濟學領域是一個堅決的、但完全不是忠實的馬克思主義者」<sup>②</sup>。在經歷了數十年的孤獨和痛苦的探尋之後，斯圖盧威宣布自己鍾情的是「保守的自由主義」思想，推崇的是立憲主義的國家發展道路，傾心於英國式國家體制。

斯圖盧威的自由主義政治哲學觀點經歷了一個發展過程。最初，在1905年革命失敗之前，他還是照搬英國自由主義的理念，即堅守「絕對的個人主義」的原則，強調「任何國家，任何民族精神都不是本質和實質」，「自由主義就其形式是作為對個人不可分割的權力的承認，……是真實的民族主義的唯一外表，是真正的對民族精神的尊敬和自尊，是對民族精神的

活生生的載體和民族精神創造者權利的承認」，斯圖盧威反對「對經驗主義的國家的神話，即神話任何形式的國家政權」，他還在國家中發現了「超乎人的存在的特別傾向」，國家是超理性的和「脫理性」的<sup>③</sup>。但是，1905年的改革、革命和失敗驚醒了斯圖盧威，他在改革和革命中看到了個人主義和個人欲望的極度膨脹。政府和最高統治者出於對自身利益的考慮，拒絕和拖延改革，最終以國家暴力的血腥方式壓制了人民大眾的民主和自由呼聲。反對派和激進主義者出於對國家的憎恨和個人欲望的放縱，拒絕來之不易的改革成果，結果是個人主義戰勝了理智和責任，最終將俄國推到革命的深淵，給國家和民族帶來了巨大災難。通過《路標》和《來自深處》的探討，在經過深刻反思之後，斯圖盧威的自由主義思想和政治哲學觀發生了根本轉變，即將國家利益和「偉大的俄羅斯」利益放在首位。斯圖盧威承認在個人和國家之間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作為個人政治生活原則的自由主義與作為「國家限制其內部的個人活動範圍的力量」的帝國主義有着深刻的衝突。他試圖調和這一矛盾和衝突，致力於將自由主義與愛國主義結合起來，將「偉大的俄羅斯」作為自己的最高信念和最終歸宿。他認為，民族精神活躍和存在於國家之中，引導新老一代人思想的繼承，精神世紀存在於每個人的生命之中，所有民族都與「最高原則」（Вещное начало）相連。他提出了「愛國主義情感」（Патриотический эрос）的概念，愛國主義即是對祖國的愛，在「個人生活與國家使命」結合的基礎上理解不合理的宗教情感和道德的完善。最終，在他政治哲學研究中，國家學說處

斯圖盧威始終堅信自由主義思想，無論對左翼還是右翼陣營都進行了長期批判，同時也被迫接受來自左右兩個陣營的詰難。在經歷了數十年的孤獨和痛苦的探尋之後，斯圖盧威宣布自己鍾情的是「保守的自由主義」。他致力於將自由主義與愛國主義結合起來，將「偉大的俄羅斯」作為自己的最高信念和最終歸宿。



於中心位置，而「自由俄羅斯帝國」(Либеральная российская империя)——「偉大的俄羅斯」的思想則是國家學說的核心所在。正是在政治和法律哲學上表現了他的自由保守主義(Либеральны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或稱保守的自由主義(Консервативный либерализм)觀點的特點。

### 註釋

① К. Ф. Шаццлло, *Русский либерализм накануне революции 1905-1907гг.*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5), 211.

②⑩ 赫克(Jullus F. Hecker)著，高驊、楊續譯：《俄國革命前後的宗教》(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頁150；294。

③⑫⑬⑭ Н. А. Бердяев и др., *Проблемы идеализма* (Москва: свет, 1902), 1; 93, 98-99; 7; 5.

④ 庫夫希諾夫認為最初是米留科夫(П. Н. Милюков)提出辦報建議的。見В. А. Кувшинов, “Кадеты в России и эмиграции”, in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no. 4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5), 44.

⑤ 茹科夫認為完全有理由認為這就是斯圖盧威與社會民主黨人完全脫離關係的標誌時間。見П. Б. Струве, *Patriotica, Политика, культура, религия, социализм* (Москва: республика, 1997), 4.

⑥ П. Б. Струве, *Памяти Максимилиана Волошина. Страничка из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收“Скорее за дело! Статьи”, 載“Искра” Библиотика, no. 38 (Москва: знание, 1991), 44.

⑦ 同註⑥，頁8-9。

⑧⑬⑭ С. Л. Франк, *Биография П. Б. Струве* (Нью-Йорк: Чехов, 1956), 51; 75; 111.

⑨ 洛斯基(N. O. Losskil)著，賈澤林譯：《俄國哲學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頁219。

⑪⑫⑬⑭ 基斯嘉柯夫斯基(B. A. Kistiakovskil)等著，彭甄、曾予平

譯：《路標集》(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頁21；148；156；154。

⑫ 當代俄羅斯學者雅科夫列夫(А. А. Яковлев)認為斯圖盧威是《路標》的首議者，《路標》可稱為「斯圖盧威運動」(Струвенская компания)，然而斯圖盧威最好朋友弗蘭克認為首議者是格爾申宗(М. В. Гершензон)。見М. О. Гершензон и др., *Вехи/Из Глубины* (Москва: правда, 1991), 502；又見註⑩，頁81。

⑬ 有關斯圖盧威在《路標》文集中的詳細思想，請參見張建華：〈以路標為界：俄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思想波瀾〉，《歷史研究》，2003年第5期。

⑰⑱⑲⑳㉑㉒㉓ М. О. Гершензон и др., *Вехи/Из Глубины* (Москва: правда, 1991), 151-52; 146; 462; 237, 239-40; 241; 241; 243; 543.

⑳ П. Б. Струве, “Россия”, in *Философия и жизнь*, no. 8 (Москва: знание, 1991).

㉑ О. А. Михайлов, “Возвращенный Бунин”, in И. А. Бунин, *Окаянные дни* (Тула: бинокль, 1992), 13.

㉒ 關於1921年後斯圖盧威思想的研究，參見張建華：〈流離與孤獨：僑民時期斯圖盧威的保守自由主義思想〉，載《劉宗緒教授紀念文集》，(長沙：嶽麓書社，2004)。

㉓ П. Б. Струве, *На разные темы (1893-1901гг)*,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русская мысль, 1902), 541, 542, 406.

張建華 1962年生，1995年獲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歷史學博士，現為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和博士生導師。1998-99年為俄羅斯莫斯科大學高級訪問學者，2001-2002年為德國埃爾蘭根大學漢學系訪問教授。主要從事俄國思想文化史研究，近著有《俄國史》、《紅色風暴之謎：破解從俄國到蘇聯的神話》及《俄國現代化道路研究》等。